

浙商

史料研究

ZHESHANGSHILIAOYANJIU

韩永学 著

欺人一两折福，欺人二两折禄，欺人三两折寿



范蠡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基地——
浙商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成果
○浙江省企业管理重点学科基金资助

浙商史料研究

ZHESHANG SHILIAO YANJIU

韩永学 著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 哈尔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商史料研究/韩永学著. —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717-963-4

I. 浙… II. ①韩… III. 商业史-史料-研究-浙江省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967 号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测绘路2号 邮政编码:150086)

哈尔滨海天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本: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18.25 字数:521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7-963-4

印数:1~2 000 定价:55.00 元

自序

浙商史料浩如烟海,零星散布于浙江的史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浙东学派、近代商帮文化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之中,其价值巨大。我们理应挖掘浙商史料的思想,从而为浙商提供具有一定指导价值的理论参考。同时,通过对浙商史料的探索、提炼与总结,力图形成浙商史料的学术思想体系,为浙商研究提供基本的学术思想史料。

目前,一些专家学者在浙商历史文化领域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发表了一些专著、论文。但运用东方管理哲学思想挖掘浙商的史料价值,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 with 基本范式。在对浙商史料的研究上,没有很好地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以及浙商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经营思想加以提炼与应用。因此,对这一领域的探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笔者试图通过探索性研究,填补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

现代国内学者,包括浙江学者,对浙商史料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如《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董平著)、《浙学研究集萃》(万斌主编)、《浙江文化简史》(余德余著)、《走读浙江》(王旭烽著)等等。关于浙商文化传统的继承,陈立旭教授创造性地运用演化经济理论来阐述浙商的文化遗产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浙商历史所蕴涵的传统文化价值,通过专家学者的解读,逐渐显示出浙商史料的文化魅力与世界性意义。

古代学者关于浙商思想文化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从西汉王充直至清代的黄宗羲,他们的研究给浙商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经验。

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上,西汉时的王充被称为始祖级的人物。他的以“实知”为主体的知识论最终归结到知识在经验世界中之实用价值的切实转换。宋代的事功学派,开创了中国商业文化的新时代。在这个时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南宋时期被合称为“浙东事功学”的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婺学)都大胆地提出了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对浙商的影响可谓至深,在观念形态上直接影响了浙江商人的经营理念与方式,乃至商业行为。明清时期主要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阳明心学和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等都提出了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王阳明的心学几乎与西方新教改革同时出现,体现了对个体、个性的发现与重视,不仅影响了浙江一方水土,使浙江的工商经济生根发芽;而且被日本等国家作为经济腾飞中精神的源泉和动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东方各国政治家、企业家的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工商业的进步主张。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种工商皆本的观念充分说明黄宗羲试图推翻“崇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视商为本”。

对于“浙商史料汇集及研究”课题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是继承浙商传统文化。浙商传统文化具有七八千年的文化底蕴,蕴涵了丰富而富有智慧的经商思想,尤其对浙商史料所蕴涵的企业经营思想与商业伦理思想进行深入挖掘,有助于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二是创新浙商传统文化。对浙商史料进行挖掘、梳理等创新性研究,有助于浙商历史文献学的现代建构,赋予东方传统文化全新的科学内涵,充分张扬浙东学派的实用主义思想。对浙商史料的探讨,更有助于浙商企业文化的有效建构。三是能够实现浙商传统文化思想与 modern 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的有效嫁接。其现实意义在于:一是有助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建立拥有“世界级公民”的现代企业,并突显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企业文化。二是有助于市场经济中诚信文化的有效建设,使“买卖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儒

商”。三是有助于东方文化的柔性管理与西方文化的刚性管理的有效融合与统一,建造中西合一的科学管理模式。该选题的价值在于:一是对浙商史料所蕴涵的哲学思想的挖掘,其学术价值巨大。在边缘交叉的学术领域进行探索,能够使浙商史料中的商业经营思想有效地应用于浙江企业文化体系建设之中。不但上古先人的智慧得以弘扬、现当代东方管理思想得以完善与丰富,而且能够建立科学而适用的、卓越的企业文化。二是开创了浙商史料思想的哲学原理性概括的实践应用领域。以东方管理哲学为挖掘浙商史料的哲学依据,确立了独特的学术研究视角,并可以有效地提炼与概括浙商史料思想,从而应用于浙商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

本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浙商史料的文化内涵与管理智慧,从哲学层面解读与阐释浙商史料的商业伦理价值与企业经营价值;系统研究了浙商史料的商业精神,从东方管理学角度加以阐释,并说明如何继承与发扬;系统研究了浙商文化的现状、问题与建设,对浙商的历史基因、崛起与困境进行了现代审视,吸收并利用了浙商史料的文化思想,借鉴与应用了浙东学派的杰出思想。

本书比较深入地挖掘了浙江历史文化的思想精华,提炼了思想家、哲学家、杰出商人的管理智慧,古为今用;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揭开了浙商商帮的“面具”,广泛研究浙商商帮史,突出商帮的代表人物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而全面而真实地还原了浙商;同时,深入到古代、近现代研究浙商的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之中,梳理、提炼、概括、综合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

本书在东方管理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浙商史料,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浙商史料的挖掘,建立独具东方管理特色的“浙商学派”,突出东方管理的文化性、人文性。深入挖掘浙商史料的思想精髓,建立从浙东学派的事功思想到“浙商学派”的义利统一思想的思想原则。深入挖掘浙商史料的思想价值,梳理浙商史料中的范蠡的商业哲学、叶适的事功学派、王阳明的心学以及其他浙东学派的实用思想。运用浙商史料中的哲学思想阐释浙商文化,试图用刚柔相济的太极中庸思想塑造浙商,培育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浙商,使浙商走出企业生命周期的“周期怪

圈”。浙商史料挖掘的目的是,运用东方管理学的文化营养以及浙商史料中的商业智慧,打造独具特色的浙商现代企业文化。

本书共分五卷,“卷一”主要探讨了浙商的历史底蕴、商业传统、文化基因、文化继承、文化适应以及浙商成长壮大的过程;“卷二”主要探讨了近代浙江三大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南浔丝商)的发展历程,并对浙商与晋商、徽商、苏商进行了比较性研究,同时对温州商人与犹太商人进行了对比研究;“卷三”主要研究了浙东学派的商业思想体现、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表达、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变革、浙商三代的浙商精神表述、浙商民企的商会中介展开、湖商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历史表现以及甬商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文化融合;“卷四”主要分析了浙商的人本管理实践、文化理念设计、广告伦理行为、商业力量展现,对浙商进行了个性文化描述;“卷五”主要探讨了浙江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商人群体,深入分析了温商、甬商、台商等八大商人群体的起源及其表现。

本书系浙江省社科规划研究基地——浙商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浙商史料汇集及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因作者水平有限,不当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韩永学

2008年8月10日于杭州

目 录

卷 一

第一章 浙商的历史底蕴	(3)
第二章 浙商的商业传统	(25)
第三章 浙商的文化基因	(36)
第四章 浙商的文化继承	(52)
第五章 浙商的文化适应	(72)
第六章 浙商的成长过程	(95)

卷 二

第七章 宁波商帮的认知	(109)
第八章 龙游商帮的认知	(139)
第九章 南浔丝商的认知	(146)
第十章 浙商与晋商的比较	(157)
第十一章 浙商与徽商的比较	(182)
第十二章 浙商与苏商的比较	(202)
第十三章 温州商人与犹太商人的比较	(217)

卷 三

第十四章	浙东学派的商业思想体现	(247)
第十五章	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表达	(270)
第十六章	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变革	(287)
第十七章	浙商三代的浙商精神表述	(307)
第十八章	浙江民企的商会中介展开	(320)
第十九章	湖商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历史表现	(334)
第二十章	甬商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文化融合	(345)

卷 四

第二十一章	浙商的人本管理实践	(363)
第二十二章	浙商的文化理念设计	(385)
第二十三章	浙商的广告伦理行为	(406)
第二十四章	浙商的商业力量展现	(432)
第二十五章	浙商的个性文化描述	(449)

卷 五

第二十六章	温商的起源与表现	(467)
第二十七章	甬商的起源与表现	(477)
第二十八章	台商的起源与表现	(485)
第二十九章	越商的起源与表现	(497)

第三十章 杭商的起源与表现	(505)
第三十一章 湖商的起源与表现	(513)
第三十二章 婺商的起源与表现	(522)
第三十三章 衢商的起源与表现	(540)
参考文献	(546)
跋	(571)

卷一

在民间传说中，范蠡是秤的发明人。相传范蠡在经商中发现，人们在市场上买卖东西，都是用眼估堆，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便产生了创造一种测定货物重量的工具的想法。

有一天，范蠡在经商回家的路上，偶然看见一个农夫从井中汲水，方法极巧妙：在井边竖起一个高高的木桩，再将一根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上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范蠡顿受启发，急忙回家模仿起来：他拿一根细而直的木棍，钻上一个小孔，并在小孔上系上麻绳，用手来掂；细木的一头拴上吊盘，用以装盛货物，一头系一块鹅卵石作为砣；鹅卵石搬动得离绳越远，能吊起的货物就越多。

于是他想：一头挂多少货物，另一头鹅卵石要移动多远才能保持平衡，必须在细木上刻出标记才行。但用什么东西做标记好呢？范蠡苦苦思索了几个月，仍不得要领。

一天夜里，范蠡外出小解，一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星宿，便突发奇想，决定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十三颗星代表一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

但是，时间一长，范蠡又发现，一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缺斤少两，克扣百姓。他想，怎样把秤改进一下，杜绝奸商们的恶行呢？终于，他想出了改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属星，并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以十六两为一斤。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告诫同行：作为商人，必须光明正大，不能去赚黑心钱。并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会失去福气和幸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得不了俸禄（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短命）。就这样，“秤”这种计量工具便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

第一章 浙商的历史底蕴

浙江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东南一隅独有的江南文化。商人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圣范蠡,应该说浙商的历史底蕴深厚,鲜明而独特。

浙商的历史文化是一种重商的地域性文化。而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统治阶级一直把“重农抑商”作为根本的经济制度,以农为本,以商为末,把农业当做根本性大事来抓,督促和鼓励农业生产,而把商业作为农业的对立面来看,鄙夷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而浙江则不同,浙江人自古以来重实际,尊崇“事功之学”。

浙商重商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有两点:一是浙江古时为“瓯越”——孔子所称要用中原礼乐文化教化的“蛮夷之地”。正因为浙江地理位置偏远,与中原山海阻隔,能够远离封建大一统思想的控制,因此,就容易产生符合特定区域发展的文化思想。二是浙江人富有智慧而勤奋,创造了富有浙江区域特色的商业文化。

一、史前文明

1. 史前“两朵花”

浙江处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水丰沛,动植物资源丰富。考古发掘证实,12.6 万年以前已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

距今 1 万年左右,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此时的先民已学会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和制陶,他们以血缘关系结成氏族,营建村落,开始过定居的生活。新石器时代是浙江历史上非常繁盛的一个时代,土地肥沃、水网密布的浙北平原是种稻的好地方,生活着众多的氏族、部落,这里因此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以钱塘江为界,浙江的史前文划分为南、北两个体系。钱塘江以北地区形成了马

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样三支连续发展的文化体系,钱塘江以南则以河姆渡文化为主干。这两个系统的起点均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到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两地区的文化面貌已趋于一致。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和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是浙江史前文化的一头一尾,遗存非常丰富,被誉为浙江史前文化的“两朵花”,亦有人称之为浙江史前文化的“双璧”。

2.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因1973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及舟山群岛。考古学家在宁绍平原的余姚市河姆渡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原始氏族公社村落遗址。从出土的石器、陶器、木器、骨器等可以看出,当时在河姆渡的上古先民就已经使用这些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了。更为重要的是,河姆渡出土了成堆的谷壳、谷粒、稻秆和稻叶。这是亚洲最早的水稻遗存,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余姚河姆渡上古先民居住的是“干栏式”房屋,采用较复杂的卯榫结构。这种干栏式建筑在形式上有三个特征:一是底部悬空,二是正脊的两头翘起,三是屋顶的结构呈两面坡式,类似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傣家竹楼。这种干栏式建筑冬暖夏凉,可适应潮湿的气候。据考古学家分析,上古先民之所以建造干栏式建筑,是因为建筑所在地区为沼泽区,地势低洼潮湿。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致与仰韶文化的年代相当。这说明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①

3.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因193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而得名,是一支以治玉著称的史前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距今5300~4000年左右,浙江余杭的良渚一带是其政治、文化中心。良渚人已会使用石犁耕田种稻,并有确凿的文物证明他们已会养蚕织绸,尤其是制作精美的玉器、黑陶和嵌玉漆器,令人叹为观止。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社会的分化,人工夯筑的高大祭坛和墓地,琮、璧等大型玉礼器的出现,人殉和

^① 余德余. 浙江文化简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4

文字符号等的出现,无不昭示着这支文化已初露文明的曙光,它与中华大地上的红山、龙山等几支高度发展的史前文化一起,汇聚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二、古越国

1. 越人源于夏禹

越人认为禹是自己的祖先,越文化源于夏禹。《史记·夏本纪》云:“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相传夏代第六代帝王少康的庶子无余为祭祀大禹而成为于越部落的首领,当时越人“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公元前11世纪时,于越首领还参加了周朝廷的朝聘活动。

在古越时期,越人一直生活在水患之中。这就产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据第四纪学的研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晚更新世以来曾出现三次海侵——星轮虫海侵、假轮虫海侵、卷轮虫海侵。这三次海侵给古越先民带来了巨大的水患。陈桥驿在其所著的《越文化与水环境》一书中认为:“在今浙江省境内,早更新世的人类活动尚不清楚,到了中更新世,可能是越族祖先的建德人已经出现,随着假轮虫海退的发生,今省境范围空前扩大,作为越族繁衍基地的宁绍平原,当时与东海大陆架连成一片,海洋与岛屿环绕其外围,而内陆则是河湖与沼泽。远古的越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水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越人将禹看做是自己的祖先,并认为禹的墓地在会稽(绍兴)。现在在绍兴、上虞、余姚发现的关于舜、禹的古迹有十余处。顾颉刚认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故事的中心在越(会稽)”。大禹治水“得通水之理”,汲取父鲧以堵失败的教训,而以疏导的方法治水获得成功。《史记·夏本纪》云:“禹之决渎也,用水以为师”。这表明禹尊重自然规律,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①

2. 先秦时期的越国

^① 余德余:《浙江文化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12

公元前六七世纪,于越人在钱塘江东南岸建立了浙江第一个部落——于越。越王允常死后,勾践继位。勾践将于越部落活动中心从崎岖狭隘的山区迁到北面山麓广阔的平原,开始改造沼泽平原。其后,吴越虽为邻邦,却交战多年,国力耗尽,人口锐减。勾践在吴国受辱回国20年后,卧薪尝胆,问疾葬死,救贫安富,四方纳贤。至公元前481年,越国疆土“东至于句甬(今宁波舟山),西至于携李(今嘉兴),南至于姑末(今龙游一带),北至平原(今海盐一带),纵横八百余里”。至灭吴称霸中原时,国土范围广大,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江苏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南部 and 浙江全境。战国后期,越国王室内乱,日渐衰落,约在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败,成为楚国的附庸。上古时代,今天的绍兴是一片沼泽地,南有会稽山洪水的漫流,北受杭州湾海潮的冲刷。根据《越绝书·计倪内经》,越王勾践时,还是“西则通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不知所止”的状况,勾践为吴国所败,实行生聚教训,才开始零星地围堤筑塘,进行耕作。

西周末春秋初,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乱世新开,百家争鸣,商品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哲人能臣经商治世者甚多,如管仲、计倪、范蠡等,孔子高徒子贡善贾,是“儒商”一词的源头。当时浙江即为越之地,范蠡助越雪耻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以在原属浙江的越地学到的经商手段屡获巨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世称“陶朱公”,后人奉为经商的始祖。越国的商业活动主要是计倪和范蠡的经商活动。《计倪子》记载的气候经济学阐明遵循自然规律的基本观点,计倪认为,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应该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越绝书计·倪内经》云:“计倪本楚国亡公子,游于吴、越、楚之间,从事商品买卖,渔三邦之利”,后定居越国,帮助勾践兴越灭吴,主持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为越国制定了一套兴农利商的国家发展政策。计倪曾云:“余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余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①他给越国制定了“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基本国策,并且制

^① 余德余. 浙江文化简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1

定了一系列的价格政策,如将米谷蔬果定为十等,按质论价,公平交易,因而“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关于范蠡的经济思想将在下文专论。

三、商圣范蠡

早在先秦时期,越国大臣范蠡辅助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就弃官从商,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范蠡被后人誉为“经商之祖”。范蠡,字少伯,号陶朱公,楚国宛三户(今南阳)人。春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王勾践。他兴越灭吴,一雪会稽之耻,成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中的风流人物。他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重大领域均有建树。范蠡主张经济治国,这不仅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时期来说是先进的、有远见的,而且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1. 范蠡的经济思想

范蠡经济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强调要懂得经济的发展规律,并要预谋在先。他针对当时以农业经济为本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注意观察天时气象,并用“五行”之说总结出了农业生产丰歉的一般规律,就是“岁在金时,能够丰收;岁在水时,就有水灾之害,可能歉收;岁在木时,就可能出现饥谨;岁在火时,则要出现旱灾”,“每六年一丰收,六年一旱灾,十二年要有一次大的饥荒”。根据这一规律,他辩证地指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其意思是:在旱灾时,要准备舟船待涝;在水灾时,要准备车辆待旱。这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要求。他的主张用之治国则国强,用之生产则生产发展,用之经商则发财致富。^①

范蠡既十分重视宏观调控,又注重调查了解经济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策略方针。在深入调研越国经济现状的基础上,他强调指出要平衡物价,照顾到生产(农)和流通(商)两方面的关系。范蠡认为:“夫

^① 符晓黎. 简论范蠡商业活动中的管理思想. 商业时代. 2006. 25